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 方法与理论

段金生
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 方法与理论

段金生 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 段金生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222-14345-6

I. ①中… II. ①段… III. ①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D693.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837号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项万和 肖薇

装帧设计: 昆明昊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林劲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段金生 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262千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康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4345-6

定价 48.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前言

20世纪40年代初期，徐益棠认为：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①从立论的视角观察，徐氏所论之边疆民族研究，实是以近代西方学理为依据的。晚清国人对边疆问题的讨论，已经孕育着一些新的研究内容、思维及视角。但从清末民初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谈实际的边疆问题者，每每注意于‘土地’与‘主权’，而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均不甚加以重视”，边疆问题常被国人视为外交或内政问题而不甚注意，导致“其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②时至20世纪30年代后，“政府对于边疆的建设与开发，学者对于边疆的调查与研究，渐加注意，这是一种从来未有的良好现象”。^③这样，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发展成了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这一时期边疆民族研究的内容、方法与理论均有了新的突破，隐含有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发展的潜力与基本趋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表现特征是多样的，近代专业研究刊物、社团及高校教育机构的出现，大批边疆著作的出版，是其最直接与明显的表现。

这一时期关于边疆民族研究的专业刊物，由于其作者群体较为广泛，刊载内容相对丰富，发行量较大，阅读者众多，较之传统的研究

①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②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③ 言心哲：《边疆社会调查与边疆社会改造》，《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书籍，虽然可能在内容的深度或系统性上有所不及，但更易产生社会舆论影响，对于边疆民族研究的深入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关于研究边疆民族的刊物，民国曾有论者根据性质将其分为下属五类：一、涉及边疆或民族问题的政治性刊物，如《中国青年》《青年中国》《时代精神》等。二、涉及边疆或民族问题的学术性刊物，如《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金陵学报》《史地杂志》《地理学报》《科学》等。三、一般的普通边疆民族研究刊物（包括副刊），如《边事研究》《边疆研究》《益世报（边疆周刊）》《贵州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等。四、分区的边疆民族研究刊物，如《东北月刊》《东北论坛》《西北论坛》《西北资源》《回教大众》《新西北》《西南导报》《西南实业通讯》《西南边疆》等。五、边疆研究或民族学研究的专门刊物，如西南边疆研究社主办的《西南研究》、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边疆研究论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办的《人类学集刊》等。^①上述各类期刊的创办，加强了当时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与边疆社团的成立相得益彰，即边疆民族研究专业刊物的大量涌现是与边疆民族研究学术社团的成立密切相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社团，按其机构名称及其研究的空

间范围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全国性社团与区域性社团两种类型。

首先，全国性的边疆研究社团。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刊登了一批关于近代边界沿革及边患问题、边疆治理、古代边疆史地等问题的研究文章，其研究视角与方法对推动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②要强调的是，虽然中国地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科学团体，其研究内容涉及大量的边疆地理情况，但并非是一个以专门研究边疆为对象的社团。现有研

①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② 刘逊：《中国地学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

究表明,1924年在北京创立的筹边协会是较早专门以研究边疆为目标成立的近代学会,该会创设了季刊《边事》,同年5月出版了第1期,收录论文20余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蒙藏地区。^①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受社会时局动荡之影响,北京政府及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问题注意不多,边疆研究社团也并没有大范围出现:“中华民国成立至第十九年(1912至1930年),内战方告平息,然其时,京粤两方尚因政治意见不合而有争议;四川尚为一大小军阀割据之局面;而红军方力争地盘,自出政令;中央因谋内部之团结,注全力于整军齐政,以谋各方之协调,心目专囿于一隅,固未尝措意边疆也”。^②这一状况在20世纪30年代后有了极大变化。

1930年以后,受九一八事变之刺激,边疆研究社团不断涌现。1930年,即有新亚细亚学会成立,并创办了《新亚细亚》月刊。1934年,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成立,名义上由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参谋部等多部委创设,但实际为蒙藏委员会下属机构,创设《边疆通讯》。同年10月,边事研究会成立,创设《边事研究》。^③1935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殖边学会;1936年,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发起成立了边疆问题研究会;1937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地学系联合创立了边疆史地学会;1940年,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成立,设有《边疆研究》季刊;1941年,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四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边疆研究学会,并于1942年在重庆创立了《中国边疆》月刊;1941年,蒙藏委员会组织相关学者成立了中国边政学会,创设了《边政公论》月刊;此外,还有众多相关大学或机构成立了边疆研究社团。^④上述社团基本上均是以全国的视角来展开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影响力也较大。

① 房建昌:《简述民国年间有关边疆的机构与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③ 边事研究会:《边事研究会总章》,《边事研究》创刊号,1934年。

④ 房建昌:《简述民国年间有关边疆的机构与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其次，区域性的边疆研究社团。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的呼声高涨，这一时期成立的关于西北边疆的研究社团众多，并创办了会刊，主要有：西北研究会、新西北社、西北学会研究部、西北论衡社、西北导报社、西北协社、西北经济研究所、西北学会、西北春秋社、西北汇刊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西北研究社、西北农学社、西北建设学会、西北史地学会等。随着1935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及国人对西南边疆的逐步重视，^①也出现了一批关于西南边疆的研究社团，也创办了会刊，主要有：西南学会、西南协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南区办事处、西南导报社、西南边疆月刊社等。此外，还有蒙藏月刊社、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问题研究社等社团也属于这一类型。这些区域性社团较集中地关注某一区域问题，对推动该区域的边疆研究向精深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大学成立了边政学系或其他关于边疆研究的专门机构，是这一时期国人对边疆问题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在1931年左右，私立朝阳大学率先设置了边政学系，开设了蒙古文与俄文的教学课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至北平，也设置了边政学系，开设了日文与俄文教学课程。此外，私立中国大学商学院设有边疆经济系（尤其侧重内蒙经商之科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注意边疆省份的经济研究（以对东北边疆的研究最有成绩）。在1939年以后，复旦大学、云南大学，其后还有大夏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以及西北师范学院、西陲文化学院等院校均开设有边疆建设或边疆问题等科目与讲座。1944年，国立中央大学与西北大学都设立了边政学系。^②其中，国立中央大学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性，其创办的边政学系的设置相对健全，社会影响也最

① 段金生、郭飞平：《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② 林思显：《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年，第152页。

大。国立中央大学边政学系的课程设置主要从边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会、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着眼，主讲边疆民族史课程。^①虽然边政学系及边疆教育研究机构在当时仅系部分大学设置的科系，但这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第一次专门以边疆研究为对象设置的科系，对于培养熟悉边疆的人才，推动边疆研究向专业化、科学化及学科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边疆研究社团及高校边政学系的成立，对于凝集专门研究人才，推动边疆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一方面创办各种刊物并广泛发行，吸引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另一方面，也组织一批专家规划边疆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其中，以新亚细亚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与中国边政学会最为突出。它们所兴办的会刊《新亚细亚》《边政公论》等发行时间较长、刊载内容丰富，从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另外，它们也较系统地组织出版了一批边疆研究丛书。新亚细亚学会组织出版了《西北》（戴季陶等，1931年）、《中国边疆》（华企云，1932年）、《新疆之文化宝藏》（〔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著、郑宝善译，1934年）、《青海风土记》（杨希尧，1931年）、《西康札记》（任乃强，1931年）等系列边疆研究书籍。出版编纂边疆丛书，是中国边疆学会成立后的五项重要工作之一。该会曾在1943年编辑了边疆丛书第一辑，共10本，交由正中书局陆续出版；后又“打算陆续作第二辑以下的编纂，把关于边疆的政教、史地、经济、社会、文艺、各部门的著作，在一定的计划之下，分配在这部丛书里”。^②该会出版的两辑边疆丛书，第一辑由正中书局负责，第二辑由商务印书馆负责，系统性较强，但目前尚无相关史料能够将其所出版的具体书目全部厘清。中国边政学会成立后，也组织

^① 罗玲、李禹阶：《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高校版）2010年第7期。

^② 黄奋生：《边疆政教之研究·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4页。

出版了边疆政教丛书，如《新疆研究》（李寰，1944年）、《中国回教小史》（白寿彝，1944年）、《新疆之水利》（倪超，1948年）、《云南边疆地理》（严德一，1946年）等。与中国边疆学会出版的边疆丛书相似，中国边政学会组织出版的边疆政教丛书目前也没有史料能够将其所出版的具体书目全部厘清，两会计划出版的一些书目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全部的出版计划。

而伴随近代西力东渐，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质效超越了以往。大批来华传教士和留洋的中国学者不断翻译介绍西方的近代学理，促使传统中国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不断发生变化或转型。作为传统史学研究范畴内的边疆民族研究也相应地发生着转变，这一转变在20世纪的30年代与40年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具体而言，就是30年代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未提出相对完整的边疆民族研究理论与方法，直至40年代才有了较明确的学科方法与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规模宏大，但大部分研究成果尚处于对边疆地区概况的介绍阶段，研究的深度有待提高。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内容涉及边疆的政治、自然环境、军事、社会等多方面，但以普通概述为主。20世纪3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当时边疆研究中存在深度不够的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阐述。陈祥麟就明确指出当时国内众多关于边疆研究的丛书和刊物，如果认真审察它们的内容，“大都是人云亦云，辗转抄袭，并且虚造事实来充塞篇幅”；而“许多考察团到边地去考察，他们到了边地，仅调抄了地方政府的旧卷，并没有作实际的考察工夫，这种旧卷，既不是科学的，拿时间来讲，概是清末民初的东西，并且内中充满了‘概’‘略’等字样，纯是一种无根据的估量”。该论者坦言道，上述情况的丛书和刊物只能唤起一般民众注意边疆的意识，但不能把它们当作研究边事的材料。^①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上述状况依然存在。1937年，有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在

^① 陈祥麟：《研究边事的基本问题》，《边事研究》创刊号，1934年。

论述自己的著作时亦言：“中国近年关于边疆问题的新书，已出了不少，现在这本小册也有一大部分靠他们做参考资料。可是，笔者认为遗憾的地方，第一……对于边疆问题的因果关系，未作充分的、严正的剖析；第二，有一部分著作又嫌芜杂，虽可供我们以相当的材料，但是未能给我们以一个明了的观念”，承认其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是“通俗的东西”，很多边疆研究内容仅是“梗概”。^①

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受人类学、民族学等西方学科理论发展的影响，学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西方的民族理论、民族调查方法等在边疆民族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有所实践。早在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就先后组织相关学者到滇、川、桂等省区进行人类学调查。到了30年代，尤其是抗战后，“边疆考察团”风起云涌。政府行为的主要有教育部组织的拉卜楞藏族巡回施教团、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组成的西北垦区调查队和西南垦区调查队等；^②学术界主要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先后组织的对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省区的民族调查。^③而受中央研究院及其他学术机构倡导民族学的影响，部分青年学人开始在国外研习民族学，国外许多关于西方民族学的权威论著也不断被译介传入国内。^④但在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

① 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编者的话》，上海：引擎出版社1937年，第1—2页。

②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③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8—185页。

④ 据徐益棠统计，主要如下：[英]R·R·Marett著、张铭鼎译：《人类学小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英]R·R·Marett著、吕叔湘译：《人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日]西村真次著、张戎军译：《人类学泛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20年；[芬兰]E.A.Westermarck著、王亚南译：《人类婚姻小史》，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美]L.H.Morgan著、杨东尊、张栗原译：《古代社会》，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日]二阶堂招久著、汪泉译：《初夜权》，上海：北新书店，1929年；[英]B.Malino wiski著、林振鏞译：《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法]C.Vergue著、许楚生译：《家庭进化论》，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法]C.Letomneau著、卫惠林译：《男女关系的进化》，上海：开明书局，1930年；等。参见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代初,这些“纯粹的学术之著作,与实际的边疆问题,并未发生如何关系,于边疆问题之解决,仍未有丝毫裨益”,其影响范围较受局限。^①

九一八事变后,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成为国人普遍认识,而随着滇、桂等省发生了不少民族问题,国人“乃知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故而边疆各省竞设学校、广训师资,开展民族研究工作,对于边疆民族研究有相当贡献。这一时期,民族学家一方面撰述通俗性文字以引起一般人之兴趣,一方面发表学术性研究论著以奠定民族学研究的基础。^②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在这一时期先后被系统地引入中国,并在边疆民族调查中进行了实践。学者们在边疆民族问题的具体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运用这些理论或方法,但尚未形成较系统或独立的边疆民族研究方法与理论。

1940年就有学者指出,边疆问题的重要已基本成为共识,但“边区问题的中心及内容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尚需要进一步讨论,必须重视边疆问题实际与方法问题的探讨。^③可以说,此论即是对30年代边疆民族研究方法与理论缺失的检讨。当然,在30年代关于边疆民族研究的相关论著中,已经逐步开始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缘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40年代边疆民族研究学者提出专门以边疆民族研究为具体对象的方法与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显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一种线性发展历程。

20世纪40年代,关于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有了根本突破,大量学者参与了探讨。1941年,作为40年代最有影响的边疆研究刊物《边政公论》,在其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边疆问题的重要性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于边疆建设的步骤和方法,则尚未能与目前的需要相配合,而待讨论的地方正多”,“研究边疆

①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②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③ 姜蕴刚:《边区问题之理论与实际·序》,西南边政协会1940年,第1页。

亟需方法的训练和眼光的培养，已是无可疑议”。^①上述认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存在的问题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导向。这一时期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我国边疆研究落后于国外的客观事实及加强研究深度的迫切性：“我国边疆之研究，已较英法俄日等国人士落后数十年，故吾人对于我国本身之边疆状况，其认识程度且不逮远甚”。^②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论著，系统地从学理层面对边疆研究的方法、途径等进行了阐述。柯象峰、张少微、林耀华、李景汉、吴文藻、凌纯声、吴泽霖、卫惠林、胡耐安、杨成志等学者，是其中较为凸显者。

柯象峰撰写了《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一文，认为举凡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学者均应属于中国边疆研究的社团，但研究社团中的主角应是民族学家及社会学家；边疆研究中，人文研究重于自然研究，而人文学科中民族社会的研究又重于其他方面。此缘于他认为增强边疆民众精神文化的内向是维护边疆领土完整的重要途径。并罗列了具体的研究方法步骤。^③张少微认为边疆社会的研究内容包括地理环境、种族、人口、语言、家庭、经济、政治、宗教、教育、道德、消闲、医药卫生、社会性传说、社会性禁忌、国际关系等15个方面。研究方法上，至少有图书法、问卷法、人格分析法、摄影法、观察法、访问法、社会个案法、语言法、征集法、购置法、地境法、测验法、量度法、地图法、清丈法、抄录法、绘制法、统计法等18种方法可以运用。张氏还制订了中国边疆社会的研究步骤，主要分为初步观察、收集资料、训练人员、组织团体、研究方式、统计整理等6步。^④林耀华的《边疆研究的途径》、李景汉的《边疆社会调查研究

① 边政公论社：《发刊词》，《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

② 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

③ 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

④ 张少微：《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边政公论》第1卷第3、4合期。

应行注意之点》等文，均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途径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他们关于边疆研究方法的探讨，多借鉴了西方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方法。虽在具体方法、步骤的讨论中存有差异，但本质是近代学理意义上的边疆研究方法的构建。

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们一方面重视边疆研究方法的探讨，另一方面也重视边疆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中国古代并未出现关于边疆研究的专门学问。而“九一八后，国内大学有不少设立边政学系，而却无边政学的科目。抗战以还，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学校特设边政专修科，蒙藏委员会亦专开蒙藏政治训练班，于是‘边政史’，‘边政研究’，‘边疆政治’，‘边疆政策’，这一类科目名称，始出现于课程类”。^①此语表明，加强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已经成为当时研究边疆学者们的重要认识。这一时期关于边疆研究学科理论的探讨，以吴文藻最为典型。

吴文藻较系统地提出了边政学理论，对于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有筚路蓝缕之功。吴氏认为，边政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边疆政治，系边政之广义；边疆行政，系边政之狭义。边疆政治可以包括边疆行政，但边疆行政不能包括边疆政治；边疆行政可以视为边疆政治之一部门，以研究边疆政治为主要对象。至于边疆政策，是根据边疆政治原理推演出来的，必须凭藉边疆行政机构始能见诸实施，地位介于边疆政治与边疆行政之间。广义上的边疆政策可视为边疆政治之一部门，狭义上它可包括在边疆行政范围之内。而研究边政学的观点主要是政治学与人类学两种。二者中人类学观点为主，政治学观点为副。吴氏如此看法，是因为他认为“边政与乡政是吾国现阶段上中央政治的核心问题”，而边疆民族是边疆政治的关键，这是必须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边政的主要原因。吴氏认为人类学所谓的边政，系指狭义

^①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的边疆行政而言；政治学所谓的边政，指广义的边疆政治而言。为了体现贯通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原则，吴氏在关于边政学理论的阐述中采用了边政的广义概念，即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而边疆民族与边疆政治息息相关，故边政学也可表述为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学科。^①吴文藻的边政学理论，虽然系从人类学的视角来进行构筑的，但对于当时边疆民族研究的学科建设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推动作用。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选编了18篇有关边疆民族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探讨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关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知名学者，文章主要就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问题展开探讨，是最早利用西方相关学科理论结合中国边疆民族社会实际进行的探索。当然，前辈学者所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一些局限性，但均是前辈学者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他们关于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方法 with 理论的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亦不过时，尽管时代学理及国策的表述等不尽相同，但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所选文章，有少量残缺或字迹不清者，均用□号标明，纠正错别字或标点、增补漏字或标点时，用〔 〕表示。总体上，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窥其全貌，直观地了解当时的写作语境，文章的文字与格式等均系按原文录入。但因所选文章体例各异，为遵从现行出版规范，对所选文章序号进行了统一，在此说明。由于编者学识的浅陋，本书选材难免挂一漏万，存在编选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教正。

段金生

2015年11月25日

^①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目 录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1
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	21
卫惠林：中国边疆研究的几个问题	36
张少微：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	40
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	61
李景汉：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	81
言心哲：边疆社会调查与边疆社会改造	96
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	105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	144
杨成志：边政研究导论	162
梁钊韬：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	178
健 飞：推进边政与训练边政人员	193
陶云逵：论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	202
吴泽霖：边疆的社会建设	212
卫惠林：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	222
胡耐安：边疆问题与边疆社会问题	234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	249
张少微：研究苗夷族之内容及方法刍议	283

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为边政公论出版及中国民族学会七周年纪念而作

徐益棠

一 导言——边疆问题之发生，与民族学之萌芽

民国二十年之前夕

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始创于外国之传教师，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为最有贡献，就余所知，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庋藏之稿本及小册，数以百千计，即就安南河内之法国远东学院，已颇可观。盖自鸦片战争以后，西人之旅行吾中华者，年有增加，归辄录其所见闻者以成书，虽精审者少，然经政府以及学术团体之奖掖与提倡，其中亦不乏高明之作，而尤以一九〇六年前后为最发达，盖其时吾国国势凌替，列强正谋蚕食我边疆之会也。

我中华民国成立至第十九年，内战方告平息，然其时，京粤两方尚因政治意见不合而有争议；四川尚为一大小军阀割据之局面；而红军方力争地盘，自出政令；中央因谋内部之团结，注全力于整军齐政，以谋各方之协调，心目专囿于一隅，故未尝措意于边疆也。

其时，边疆问题已有相当严重：外蒙早已苏化，政治经济诸端，早为苏联政府所支配；土西铁路方告完成，新疆益见威胁；而黑龙江兴安岭以西，苏联正陈军示威，凶焰正炽。日本努力争逐，投资于两线（南满路与吉会路）两港（大连港与罗南港）之建筑；利用韩民，移垦延边反客为主，有取而代之之势；而南满沿线煤铁农林之经营，势其锐猛，野心日渐暴露。康藏时起纠纷，而尼泊尔又复有内犯之状

态；滇北之界约未定，而滇南矿产问题又渐趋严重。各国利用我国内部多事之机会，益复肆其侵略，于是边疆更岌岌不可终日矣。

虽政局阉隍不定，而国人之科学研究殊突飞猛进，在生物学则有各大学生物学系及各生物研究所边区生物标本之采集与鉴定；在地质学则有中央地质调查所及其他省分之地质机关边省地质调查；在古生物学则有周口店北京猿人之发见；在考古学则有仰韶沙锅屯，城子崖，昂昂溪以及其他各处古物之发掘；在语言文字学则有边区各民族古代及现代语言以及甲骨文之研究；在心理学与生理学则有脑部，血液，及体质测量之研究。是时关于边区民族之知识，大都为各自然科学家自边区附带而来，而中央研究院之成立，又成为推动学术研究之主要机构。当是时，科学考察团之纷起，尤足以突破中国科学史上之纪录：如安得思Andrews中亚调查团，斯坦因Stein新疆考察团，中瑞合办之斯文赫定Sven Hedin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央研究院贵州科学考察团，中国科学社四川标本采集团，中山大学川边考察团，滇边考察团，徕山生物采集团以及史禄国教授Prof. Shirokogoroff领导之凉山民族考察团，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标本采集团，而国府特组之西陲学术考察团，亦于二十年三月成立焉。不独一反昔日专从外国人著教科书中求取知识之态度，且从吾国固有材料中实地寻找问题，推究结论，科学研究之正轨，乃于国是纷纭中获得之，不可谓非我国民族复兴史上之一大转捩也。

吾国过去学术界，以为读书无裨经世，救国必从政治，于是奔竞于庙堂之上，讨论国是；而当时国内聪明睿知之士，亦一变其态度，鄙弃名利，断绝仕进，奔走于荒徼僻壤，努力于田野工作，我中华民族之命运，不于此时奠定其最坚固之基础耶？

惟当时学术考察团所注意者，大都为纯粹之自然科学，边疆上之实际问题，常被视为属于外交或内政之问题，科学家不甚加以注意，偶或有所纪述，大都由于好奇，零星简略，不足以供参考，盖其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而民族学在我国之幼稚，在当时